

山西文史资料

第 50 辑

(1987年第2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主任委员：王 西

副主任委员：姚莫中 郝树侯 张 友

李葵源 乔志强

委 员：刘子威 孟昭第 马 明 张豪若

杨复生 翟品三 李俊虎 罗广德

杨小池 刘锦毅 李裕民 刘海清

张国祥 叶昌纲 赵修身 田际康

王秀明 刘存善 霍 军

主 编：李 泰 责任编辑：林 登

目 录

遥远的祝贺	郭沫若 (1)
转战西北的剧宣二队	田 汉 (2)
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	阳翰笙 (6)
抗敌演剧队是革命的文艺队伍	冯乃超 (13)
表现民众忧患的剧人们	张光年 (18)
在战斗中成长的一支艺术部队	《新民报》 (20)
战斗的十年	剧宣二队队史编委会 (23)
一、集合在抗敌救亡的旗帜下	(23)
二、县华林集训和三队的建立	(34)
三、奔赴西北战场	(40)
四、在革命摇篮延安	(48)
五、战斗在晋东南前线	(54)
六、在九十三军士兵中的工作	(61)
七、常村休整与洛阳会师	(67)
八、重返二战区	(75)
九、深入晋西农村	(82)
十、“一·二六”被捕事件	(93)
十一、“不能让剧宣二队倒下去”	(108)
十二、抗战胜利前后，特务黔驴技穷	(114)

- 十三、在太原的胜利斗争..... (123)
十四、由太原转战北平，演完最后一幕..... (133)

附 录：

- 我 们 (诗).....张帆遗作 (155)
演 戏 (剧本).....蒋旨暇遗作 (168)
剧宣二队成员名单..... (188)

后 记..... (194)

插图： 隰县小西天 (国画 古一舟作)

照片 8 幅

题 签：薄 一 波

题 词：戎 子 和

遥 远 的 祝 贺

——致剧宣二队的朋友们

郭沫若

剧宣二队的朋友们：你们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信，我今天才接到，你们要我在八日前寄关于《孔雀胆》的文章给你们，适逢停航一星期，恐怕来不及了吧，我姑寄这封信，以致我遥远的祝贺。你们转瞬便要迎接队九周年的纪念日，我同你们一样感受着一种无可言喻的又高兴又感叹的情绪。公然满九年了，你们在这九年当中历受了多么大的艰难和困苦呀！你们突破了这一切，而能荣耀地在北平工作，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你们的兄弟队，有些是复员了，有些还和你们一样在艰苦中撑持着工作，他们的精神和你们一样，都是值得钦佩的。我诚恳地希望你们把从战地和乡村获得的经验，转介给城市的居民，而同时你们的工作时常改进，使你们自己成为人民艺术家。这可算我对于你们的一点诚恳的贺礼。

你们要演《孔雀胆》我自然乐于同意。你们在演出上是有经验的，一定能克服种种困难，而使剧本的缺点得到补救，你们不必拘泥原作，遇必要时可以大刀阔斧地删改，但请把重点放在尊重人民的身上，段功和阿盖的心理动态，希望你们能够细心刻画。如有什么不解和问题时，请你们多多向马彦祥诸先生请教吧！

谨致 虔诚的遥远的祝贺！

（原载1947年1月《新民报》）

转战西北的剧宣二队

田 汉

“剧宣二队”为二十六年^①在武汉成立的“拓荒剧团”所改编。全国“剧协”成立，该队乃于二十七年元旦改为“剧协”直属之“话剧移动第七队”。“一二八”纪念日，在保卫大武汉口号下，全队沿汉水而上，以戏剧、音乐、文化的拓荒者的姿态出现于鄂中鄂北农村，展开武汉外围的深入的政治动员，于极度的艰苦中，在湖北应城、天门、京山、鍾祥、襄樊等县巡回半年。一般工作外，主要的是公演宣传剧，醉生梦死的市民发誓自新，壮丁被激动而上前线者不一而足，有鄂北新收编土匪四百人观该队演剧后，自动请缨杀敌，其工作所发生之效果于此可见。

二十七年六月由襄樊赶归武汉，经总政治部改编为“抗剧第三队”。队员与装备皆经调整补充，“七七”周年纪念日与各友队在武昌受训，及至武汉紧张，各队奉令分发各战区工作，该队被分派到西战场第二战区。二十七年九月九日全队二十八人由汉口出发，数百青年男女唱歌欢送这支文化部队向华北国防第一线远征。

他们沿平汉路北上，在漯河、许昌、郑州整天遭受敌机空袭，旋冒敌人隔河炮击，渡过潼关，到达西安。在西安演出多次，举行音乐大会、美术展览，并协助地方当局发动募寒衣运动，创办歌咏训练班，短短一月间成绩斐然。是年十一月离西安北行，沿途工作经洛川、宜川，到圪针滩渡河转入山西敌后，辗转在吕梁山，流动于吉县、大宁、隰县、灵石、永和等地，像一支文化

的游击队出没在敌人据点的空隙间，他们携带的剧本多不合西北战地条件，优美的几部合唱亦往往有农民们认为不整齐，于是该队开始在士兵民众中深入学习，广泛搜集现实材料，注意地方形式与民间艺术，举办创作周、创作月，鼓励写作。在表演技术上，亦开始注重适合广大军民理解与爱好的民族形式问题，又为适合战斗环境，在剧团组织机构上亦改得更军事化，更适合于戏剧运动战的需要。敌人四路围攻吉县时该队毫无恐惧，反与战斗形势配合展开更积极的工作。公演教歌之外并集中四五个剧团，举办抗敌戏剧训练班，养成一百数十青年戏剧干部。直到二十八年三月敌人走出吉县后，该队才渡过黄河，回到第二战区首脑部的兴集。

当时晋东南部队与地方政府直属及民众自组的剧团达数十单位，活跃在战地的每个角落，技术水平虽不甚高，然学习精神之旺盛使人感佩，他们常步行七十里以外去抄剧本，或一天赶九十里路来看该队公演。该队得豫北军政当局电邀，于四月二十八日以《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告别兴集，重又踏上山峦重叠的征途，在敌寇日夜的轰炸与炮击的威胁下，冒黑夜偷渡潼关，穿过了灵宝、陕州，这一年青的行列又出现在陇海线上。当该队到达渑池不到三日，而陕州专署巡回剧团，在洛阳工作中的“抗剧十队”，闻讯先后赶到，再加上驻渑十八补训处剧团，一时集中了百数十同岗位上青年战友，各以烈火般同志的热情从事工作上的讨论，并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公演，以资互相观摩。公演之后，在各界欢送中他们又告别了渑池，渡过黄河，向中条山进军，经垣曲、阳城、高平，经两个月艰辛跋涉复于“七七”第二周年的前三日到达长治。正准备“七七”纪念公演，适遇敌人九路围攻晋东南，乃随军转进焦作，“七七”两周年之夜，该队正与当地数十剧团联合公演之际，敌人围攻长治的步兵已经迫近城郊。他们当夜就开始长夜行军，随着部队转进到太岳山根据地。在敌人四面包围中，在经常所谓“扫荡”战中，该队化整为零，分成宣传，训练，采

访等三小组，训练小组举办了剧训班，文艺小组配合军队政治工作编印传单、画报及采访材料。另一部分与当地剧团联合组织“前线工作队”，在战场部队及战地医院中巡回演出，前线军民闻中央派剧团慰劳他们，莫不感奋欢跃，他们适应敌后环境，临时变换组织与工作方式，战斗在戏剧的真正前哨，部队的弟兄们称他们为“艺术小兵团”，实际他们已成为战斗中不可少的“兵种”。他们每一次演出后，即将幕布与服装道具驮上骡背，队员除随身行李与化妆品外，并荷步枪，挂手榴弹，冒炎热与寒冷迂回于峻峭山壁之间，有一夜行五六十里再赴另一地区工作，如是者遍历九八、二七、九三各军，其工作精神深得各部官兵一致赞许。

晋南七个月工作中，他们奔波了五千余里，在晋绥军中工作极能沟通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常工作地点距敌人近则十数里，远亦不过百五十里。演剧工作外并依各部队之嘱托主办艺术训练班，分戏剧、音乐、美术等系，受训团体达百数十单位，人数累千，在艺术青年中留下深刻影响。

因为跋涉过劳，营养不足，又饱受严寒酷暑，男女队员半数生病，二十八年冬首先牺牲了他们队的“小弟弟”——十七岁的青年诗人庄玄，接着他们的队长徐世津病倒了，徐君素顽强果断，及归重庆养病，卒于宽仁医院，但这些不幸未尝挫折该队青年冒险之勇气。“擦干我们的眼泪，以血汗来纪念我们的死者，踏着他们的足迹，为中国新艺术奋斗到底。”这是他们第二个领导者王负图君在追悼会上的讲演，也是全体同志的誓词。于是调整机构，由赵辛生任队附，江啸平任总务，张帆任编辑，田冲、鄂雪铃分任剧务、音乐组长，经一度补充队员仍恢复原额，配备得更整齐。从敌人九路围攻到二十九年所谓“四月攻势”，他们在封锁线上冒万千危难，钻来钻去达一年余。二十九年九月奉令渡过黄河，穿过敌人两道封锁线，又重返渑池，这青年的行列第三次活跃在陇海线上。

二十九年冬季他们正在渑池休整，奉令改编为总部“艺术宣

传第三队”。至三十年元旦，即以“艺宣三队”旗帜在渑池、洛阳一带，两月中演出十三次。上演剧目《败家子》、《演戏》、《塞上风云》等。尤其是《败家子》一剧颇能表现出敌后农村戏剧的特点，在洛阳义顺公演《祖国》，亦得到观众热烈拥护。尤其值得记录的是该队在此与抗剧十队，抗宣四队兄弟相遇，为了珍重这机会，他们举行三队联合公演。所采的剧目不是都市化的剧本，而是短小精悍富于战斗性的独幕剧，并重视小型的旧形式的利用，意在渐次创造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民族戏剧。

《黄河大合唱》集中了三个兄弟队伍，雄壮的歌喉代表了中国青年强烈的吼声。他们交换经验之外，还交换了歌曲剧本，又集合全洛阳剧人讨论如何展开西北剧运，建立戏剧堡垒。其意义之大不下于一、九、二、八各队在长沙会合时。

旋该队又奉总部电令由义马常村跋涉七百里回吉县重新改编。三十年五月他们又以“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的旗帜在兴集各地演出《月亮上升》、《一心堂》、《演戏》、《败家子》、《反攻》、《国家至上》、《狂欢的夜》、《祖国》及三幕歌剧《农村曲》等，给沉寂的吕梁山剧运放射出活跃的朝光。但新的不幸又接踵而至，他们在河南失去了他们健壮的女同志蒋旨暇，在山西他们有力的工作者刘晨暄、郑翼云又倒在工作的岗位上了。可是这些打击并不曾减去他们工作的勇气，在晋西的僻野荒山中他们撒下了新的艺术种子。他们搜集了五百多曲民歌，他们用地方话地方的习惯演着农村的戏剧，他们把艺术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联系得紧紧地。他们把自己锻炼成一支铁的文化队而转战在西北战地。

（原载1946年9月《新民报》）

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

——忆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敌演剧队

阳翰笙

今年7月是建党60周年，60年来，革命文艺有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战斗的经历值得记载。最近我正在写回忆录，想到多少史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党的领导是一切革命事业的胜利保证。在解放区，革命文艺在党的领导下，有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人所共见的。就是在国统区，国民党掌握了政权，他们拥有优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并给革命文艺工作者种种限制和迫害，但在那里，革命文艺仍然占有优势，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不顾生活的贫困，工作困难甚至生命的危险，团结在党的周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加强与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我想，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值得参考的。这里，就我亲身参预的，简略记述一下这丰富史实中的一小段，即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的一些活动，可能是有意义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抗战展开。当时，武汉成了全国抗战的中心，党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派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在武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副部长，并直接领导了第三厅（主管宣传），郭沫若同志任三厅厅长，许多进步文化人参加了三厅工作。

1938年4月第三厅刚成立，周恩来同志就考虑在三厅的建制

下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这时100多个抗日救亡民众团体云集武汉。由上海地下党建立的12个上海救亡演剧队也大都在各战场进行了几个月的抗日救亡的戏剧宣传活动，有的化整为零，分别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有的陆续撤退到武汉，就和这些民众救亡团体一道在武汉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活动，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十分害怕人民群众力量的壮大，经常派特务进行捣乱和刁难，意欲解散这些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周恩来同志考虑到上海救亡演剧队和一些救亡宣传团体都是民间组织，不仅经费困难，而且政治上没有保障，为了保证国统区抗日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他打算把这些救亡演剧队改编为第三厅的直属团体。不久，国民党顽固派竟下令强迫解散“青救”、“民先”、“蚁社”三个最有影响的民众团体，并且勒令所有其他民众救亡团体停止活动。大批爱国青年陷于报国无路、生活无着的困境，周恩来同志决定由第三厅收编这些民众救亡团体。经过我们与国民党的斗争，迫使国民党答应了在第三厅建立演剧队和宣传队。但是给的经费少得可怜，原拟成立10个演剧队和10个宣传队。后来，由于时间仓促和经费不足，抗宣队只成立了4个。

演剧三队的前身就是张光年同志组织的在武汉市及湖北农村流动进行抗日宣传的一个群众团体“拓荒剧团”，后改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

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成立以后，加上孩子剧团一起进行了短期集训，进行了政治学习、业务准备和军事训练。田汉同志亲自和这些胸怀壮志、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在一起操练，一起跌打滚爬。郭老和胡愈之等同志给他们讲课。洪深、石凌鹤、马彦祥、应云卫等这些著名戏剧家给他们讲戏剧理论、导演、表演、化装、舞台美术方面的业务课。各队都编排了许多演出节目。集训结束时，举行了大规模的汇报和交流演出。大家情绪热烈，斗志昂扬，整装待发。在各队分赴各战区前线之前，周恩来同志亲自给

他们作了长达四、五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以毛主席《论持久战》（当时尚未发表）的光辉战略思想武装全体队员，解决了有些人头脑中速战、速胜的思想或是只想去延安而忽视国统区工作的片面想法。

周恩来同志亲自制订了14个队分赴各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有的路线，他亲自布置由地方游击队或八路军部队接应和护送。

演剧三队由张光年带领到西北二战区去，那儿是阎锡山任司令长官。为了使三队沿途不受阻碍，我替张光年写了一个“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的委任状，通知了该战区。张光年领了这张委任状，不但一路通行无阻，而且所经各县，国民党大小官员都远郊相迎，毕恭毕敬，深怕得罪了“上面”派下来的“张视察员”。后来张光年来到我党控制的吕梁游击区。这是进入自家的天地，心情豁然舒畅起来。有一天，忽然有人将他悄悄引到一边，向他出示别动队大头子康泽委任他们的证件，原来他们是政治部第二厅康泽派进游击区的特务，他们已久未领到粮饷，这下看到“张视察员”驾到，以为救星来到。于是觅得机会，向他诉起苦来，再三恳求“务请张视察员多多帮忙”！张光年同志肚里实在好笑，但作出一副认真的样子，把事情记在本上，作首肯状。后来张光年同志经组织上同意，带领三队就近去了一趟延安。他在演出会上登台讲话，三队全体同志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欢喜若狂。国民党特务连忙向政治部告发。三厅一连接到政治部转来的“状纸”30多张。后来这件事由戏剧科长洪老出面，编了许多假话敷衍搪塞过去。而张光年正是在这次去延安时，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合作，创造了最杰出的《黄河大合唱》，并由三队全体同志在延安作首次演出。

关于演剧队在周恩来同志和三厅的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详细情况，已经有不少专门文章介绍，我就不重复

了。我只简单地谈以下几点：

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和派遣演剧队和抗宣队到各战区去，特别是到国民党的军队中去，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宣传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蒋介石顽固派被迫抗战，他们随时都想用种种方式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抗战一开始，他们就是搞政府包办抗战、消极抗战、片面抗战。对人民群众救亡运动，极尽压制破坏之能事。他们强行解散抗日救亡民众团体，在地方上没收抗战救亡书籍，在安徽等地甚至用宪兵阻止《新华日报》发行。军队和前线更是禁区，群众宣传团体不得入内，社会上的抗战救亡书刊送不进去。

周恩来同志和三厅党组织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名义组织和派遣演剧队和抗宣队到各个战区前线去，到国民党军队中去，这是巧妙地利用合法手段突破国民党的禁区，打入国民党的心脏。恩来同志给各演剧队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是：随军行动，深入前线，向战地军民宣传党的主张，占领文化宣传阵地，坚持原则立场，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合法身份，争取自主条件，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各演剧队在国民党的心脏里机智顽强地展开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宣传，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抗日活动斗争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通过三厅特支和八路军办事处贯彻始终地领导演剧队，并在各队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坚持了演剧队的人事自主权（各战区无权撤换演剧队、抗宣队的正副队长；队员的去留行踪由队务会议通过，无需上报）。这些措施是周恩来同志严格执行我党在国共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具体体现。

抗敌演剧队、抗宣队成立之初就在各个队建立了秘密的中共支部和党小组，个别未及建立党组织的队，选派秘密党员指导员随队工作。各队党组织或指导员，直接与第三厅特别支部联系。

由冯乃超同志负责。四个抗敌宣传队的党组织由五处的徐步同志负责。演剧三队派到大西北二战区工作，离延安近，为了便于和组织联系，三队的组织关系从武汉转到延安中央组织部，编为直属中组部的特别支部。在各队分赴各战区前，周恩来同志召见各队党组织负责人作了指示：如遇重大问题，可以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向他汇报请示。武汉撤退前他把各队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要他们指定专人和各队的党组织负责人联系。李克农、夏衍和李亚群、左洪涛等同志都曾经负责过演剧队的组织关系和工作指导。在演剧队成立后的11年间，周恩来同志对演剧队的领导和关注从未间断过。每逢重大政治形势变化，他总是派专人或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向演剧队的地下党组织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每个重大关键时刻，他都直接给予指示，亲自领导演剧队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继续斗争。三厅“改组”后，国民党的何浩若当了三厅厅长。演剧队的建制归三厅，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把他们的人派进演剧队，但各队用种种方式进行了抵制，有的队里派了人进去，也被挤出去或是予以孤立。正因为周恩来同志在演剧队的问题上坚持了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始终贯彻党对演剧队的坚强领导，所以演剧队尽管身处虎穴，被包围在蒋介石反动派限共、溶共、反共的险恶环境之中，但他们既没有被压垮，更没有被溶掉，而是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始终立场坚定，坚持原则，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不但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历史使命，而且使自己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演剧队在国统区的斗争是艰苦卓绝的，是作出了重大牺牲的。他们一方面冒着日军的炮火，受着贫病的折磨和威胁，一方面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残酷的迫害……剧宣二队（原抗演三队）队员十三人，被阎锡山借故逮捕监禁了一年零两个月，有的同志受到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全队坚持斗争，并经党组织和重

庆以及各地文化艺术界抗议、营救，抗战胜利后才得释放……

自1939年6月平江事件以后，在两次反共高潮时期，我不断收到各地演剧队、宣传队给三厅打来的告急电报，要求营救。我们一方面立刻向周恩来同志报告，通过组织采取有效措施，同时我们向政治部部长陈诚、秘书长张厉生、贺衷寒等人义正严词地提出强烈抗议。但是这些反共家伙装着不知道，一味地敷衍推托。当我们得知二队被阎锡山逮捕的消息，三厅就直接打电报向阎锡山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同时发动重庆文化界各人民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向阎锡山抗议。“抗敌文协”、“抗敌剧协”、“抗敌影协”和沈钧儒、陶行知、翦伯赞、罗隆基、邓初民等等一些社会著名人士都打电报强烈抗议和要求释放。阎锡山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二队被捕的队员释放。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有的队撤回了根据地，有的队仍留在国统区，配合民主斗争。这些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和白色恐怖下，其中有4个队一直坚持斗争到解放。演剧队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演剧队在艺术上也是有成就、有创新的。在1938年演剧队、抗宣队成立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教导全体队员说：“要坚持艺术为政治服务，为抗战服务。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你们要入乡随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宣传的预期效果。你们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除了演戏，还要做许多工作。”周恩来同志为演剧队的艺术实践提出了指导思想，可是具体如何去做，从题材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待于演剧队的同志们自己去探索。演剧队要深入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到前线去，到穷乡僻壤的农村中去，到少数民族的地区去。不同的演出对象和不同的演出条件要求演剧队的同志们在艺术创造上踏上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

演剧队每到一地首先投入紧张的救护伤病员和难民的工作，

通过深入群众和实际，就地取材，各队都创造了许多唤起观众的共鸣，激发观众的思想感情的好作品。他们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只能自己背着服装道具走，演出条件非常简陋，可是他们因陋就简，创造了新的戏剧形式以及其它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些应现实要求而产生的，经过实践和磨练，为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创新，各队都有，而且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方面都有。当然，这些创新也是他们向民间学习，向传统学习，后来又向延安解放区学习的成果。各队还想方设法利用国民党嫡系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把延安和各根据地创作的抗日歌曲、歌剧等引进国统区演出，受到广大群众和士兵的欢迎。

1941年皖南事变后，演剧队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远离国民党军队的领导所在地到中小城市去做群众工作和演出。于是他们从街头、“野台子”走上了舞台，而他们“街头”的艺术经验又使他们创造了别开生面的舞台表现形式。1947年我在无锡看过九队演出的田汉的话剧《丽人行》。显然他们在演出上是运用了他们所探索的这些艺术经验，因而使观众耳目一新，博得了大家的赞扬。我认为这些艺术经验和创新在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发展的。我们主张向优秀的传统艺术学习，向优秀的外国艺术学习，但是我们自己在革命实践中创造的艺术经验也应该珍视，不要輕易地认为已经过时了而把他们抛掉。

从1938年8月演剧队成立，到今年已经整整43年了，经过漫长的征途，在党的培养、实际斗争的锻炼中，许多青少年队员今天已经成为文艺界、戏剧界的骨干，抗敌演剧队的战斗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再一次证明党的领导在任何困难条件下是革命文艺事业胜利发展的保证。

（原载《戏剧论丛》1981年第3期
转载时作了删节）

抗敌演剧队是革命的文艺队伍

冯乃超

万恶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诬陷敬爱的周总理，于1967年12月在其控制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黑文《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顿时掀起了一股揪斗、迫害原演剧队成员的黑风恶浪，造成了多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反动军官”等等的大冤案。凡是熟悉演剧队组建、成长和战斗历程的人，无不为他们忿忿不平，以至落泪。这冤案象一座大山压在死者和生者身上整整十年，要不是粉碎了“四人帮”，则将永无平反昭雪的机会。

1938年秋，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在武汉组建时，我是见证人之一。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内有个我党的特别支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帮助各队建立地下党组织，给个别未及建立党组织的队选派党员指导员，直接联系各队的党组织，起过党的领导作用。

组建演剧队抗宣队及收编孩子剧团，是周恩来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结果。卢沟桥抗日烽火点燃之后，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纷纷组织了许多救亡团体，宣传抗日主张。平、津、京、沪相继沦陷后，1938年夏，一、二百个救亡团体集中在武汉三镇，作了许多工作。国民党顽固派害怕广大人民起来抗日，要把这些团体全部强行解散。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关于大后方抗日宣传工作要加强，要改善的指示，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结果国民党顽